

# 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化：微观视角剖析

张俊森 余琪 周康\*

**摘要:**使用代表性企业数据,本文研究了 1998—2016 年中国制造业部门加总劳动收入份额与企业个体劳动收入份额不同变化趋势的微观基础。分析发现:(1)增加值再分配至劳动收入份额分布的底端造成了加总劳动收入份额下降;(2)再分配效应主要由市场份额增加、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企业驱动;(3)国有企业显著贡献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变化。本文的分析从微观企业动态变化的视角增进了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理解。

**关键词:**劳动收入份额;市场份额;结构效应

**DOI:** 10.13821/j.cnki.ceq.2025.01.15

## 一、引言

最近的研究发现,中国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国民收入中劳动报酬的比例,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至 2008 年“金融危机”期间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这一现象违反了被经济学界广泛接受的“卡尔多事实”(Kaldor, 1961),即劳动收入份额在长期内保持相对稳定。更重要的是,劳动收入份额的持续下降会恶化收入分配,造成收入和财富分布的不平等(Piketty, 2015)。然而,以 2008 年为转折点,中国宏观劳动报酬份额又呈现出由降转升的趋势(刘亚琳等,2018)。深入地理解这些变化背后的微观机制是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的重要前提和理论基础,且对于改善当前收入分配格局、推动共同富裕也具有潜在的政策寓意。

现有研究主要基于宏观视角、具体政策制度或企业行为等单一维度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化进行解释。本文从微观视角分析企业整体的动态变化对中国制造业部门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和要素再分配的影响,一方面为宏观视角的分析提供了微观基础,另一方面弥补了单一视角分析不全面的不足,且我们的分析在结构因素、政策和经济冲击等方面得出与现有研究一致的结论。参考 Olley and Pakes(1996)和 Kehrig and Vincent(2021)的方法,我们首先构建了一个简单的理论框架,提出导致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共同趋势效应和结构效应。结构效应被进一步分解为三种情境:“大玩家”(big player)、“超级明星”(superstar)和“明日之星”(rising star)效应。随后我们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全国税收

\* 张俊森、余琪、周康,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通信作者及地址:周康,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余杭塘路 866 号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经济学院,310058;电话:0571-88981256;E-mail:kang\_zhou@zju.edu.cn。作者感谢郭汝飞、周明海、张海峰、杨阳,第七届中国劳动经济学者论坛与会者和本刊匿名审稿专家的建设性意见;张俊森与周康感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ZD076)的资助。

调查数据对理论部分的预测进行了实证检验。

本文的实证研究揭示了有关中国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三个重要微观基础。第一,1998—2007年间,中国制造业部门加总劳动收入份额表现出与企业个体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明显差异的变化趋势。基于企业分布和结构变化角度,所有处于劳动收入份额分布上的企业的个体劳动收入份额均降低(共同趋势效应,common trend effects)部分解释了加总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绝大部分加总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是由增加值再分配到低劳动收入份额企业(结构效应,composition effects)造成的。这一发现与 Autor et al.(2020)、Kehrig and Vincent(2021)的结果存在一定差异。<sup>①</sup> 使用全国税收调查数据,本文依旧发现结构效应是2008—2016年中国制造业部门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主导因素。

第二,个体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且市场份额上升的企业造成了结构效应。1998—2007年中国制造业部门加总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不是由于初始市场份额(增加值占同行业一年份企业总增加值比例)高的企业系统性降低个体劳动收入份额所引致(“大玩家”情境),也不是由于初始个体劳动收入份额低的企业扩张市场份额所引致(“超级明星”情境),而是由逐渐降低个体劳动收入份额的同时,也逐步占据更大市场份额的企业所带来的再分配效应(“明日之星”情境)驱动。针对2008年之后时期的分析结果表明,企业个体劳动收入份额-市场份额联合变化的微观机制是持续存在且适用于不同劳动收入份额变化趋势的。

第三,国有企业显著贡献了制造业部门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变化。1998—2007年间,国有和私营部门均表现出加总与个体劳动收入份额差异性的变化。进一步的量化分析结果显示:国有企业解释了超过80%的制造业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变化,且国有部门“明日之星”企业是主要推动力量。

本文对理解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本文以新的视角和影响机制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现有文献主要从宏观国民要素收入分配(罗长远和张军,2009a;张军等,2022;柏培文和王亚文,2023)、具体政策制度或者企业行为(贾坤和申广军,2016;柏培文和杨志才2019;汪昊,2023;钱雪松和石鑫,2024)等维度研究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化,鲜有研究从行业内企业间维度进行分析(陈鸣,2023)。本文基于微观企业动态变化视角探究中国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化,一方面为宏观视角的分析提供了微观基础,另一方面弥补了单一维度分析无法全面刻画劳动收入份额变化规律的不足。

其次,本文的研究增进了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化新趋势的理解,对中国当前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现实参考意义。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展现出逐渐上升的新特征(刘亚琳等,2018、2022),但研究该阶段劳动收入份额上升因素的文献相对较少,且主要使用宏观面板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具有全国代表性的税收调查数据,本文补充和丰富了研究中国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上升新趋势的文献。

最后,我们突出了国有企业在劳动收入份额变化中的重要地位,并强调国有企业改革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劳动收入份额和国有企业改革均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议题,

<sup>①</sup> 在中国,虽然结构效应对制造业加总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起主导作用,但共同趋势效应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

我们的研究初步探究了国有企业改革对中国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影响,这对评估国有企业改革的整体效果,优化改革方案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二、文献综述

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卡尔多事实”认为要素收入分配在长期是稳定的(Kaldor, 1961),该概念构建了宏观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石。然而,对美国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研究发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些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出现持续的下降(Gollin, 2002)。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李稻葵等(2009)也发现中国宏观劳动份额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不断下降。随后有大量文献研究了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测度、变化规律,并从宏微观层面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进行了解释。

现有文献从不同角度解释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第一支文献强调有偏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例如信息技术进步(Karabarbounis and Neiman, 2014)、机器人和自动化技术等(Acemoglu and Restrepo, 2018, 2020; Autor and Salomons, 2018; Bergholt et al., 2022)。现有研究也发现有偏技术进步对不同时期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动态产生了显著影响。白重恩和钱震杰(2010)发现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提升了中国1985—1995年的宏观劳动报酬占比。黄先海和徐圣(2009)发现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是1990—2006年中国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最主要因素。利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张军等(2022)进一步验证了偏向型技术进步冲击是2000—2017年中国劳动收入份额U形变化的主要原因。整体而言,生产技术进步一方面可能带来企业劳动-资本投入调整,从而降低个体劳动收入份额;另一方面,正向的技术冲击为企业带来潜在的市场空间与加价能力,从而扩大其市场规模。个体劳动收入份额与市场份额的负向动态变化会造成部门加总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这与本文第三部分的理论和第五部分的实证结果一致。

第二支文献将国际贸易和经济全球化视为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影响因素。国际贸易显著改变了美国(Elsby et al., 2013; Guvenen et al., 2022)、法国(Panon, 2022)、芬兰(Böckerman and Maliranta, 2012)和印度(Ahsan and Mitra, 2014)等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也对中国的劳动报酬份额产生了较大影响。邵敏和黄玖立(2010)、蒋为和黄玖立(2014)分别从外资和国际生产分割视角解释了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张杰等(2012)发现出口抑制了中国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上升。使用相同的微观数据,余森杰和梁中华(2014)发现贸易自由化显著降低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而Kamal et al.(2019)则发现关税下降显著提升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这些研究显示,通过冲击需求与革新技术,经济全球化正在驱使企业调整生产行为。在此背景下,企业的要素分配方式可能与这些调整行为发生了复杂的联动,进而影响了加总劳动收入份额。我们的实证结果也显示,加入WTO加速了中国制造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与本文相关的第三支文献主要研究了市场制度和结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如产品和劳动市场管制放松(Blanchard and Giavazzi, 2003; Ciminelli et al., 2022)、企业税制

改革(杜鹏程等,2021;Li et al., 2021; Kaymak and Schott, 2023)等。其他有关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研究主要从经济转型期寻找制度和结构上的解释。从宏观要素分配视角,李稻葵等(2009)强调二元经济转型过程中摩擦性工资对国民收入分配的影响;罗长远和张军(2009b)、周明海等(2010)指出民营化对劳动收入占比的负效应。使用微观企业数据,白重恩等(2008)认为产品市场垄断和国有部门改制是中国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这与本文分析得出的国有企业改革加速制造业加总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结论一致。劳动力市场制度的缺陷可能造成企业形成买方垄断势力,从而使企业有更低的劳动投入成本和更高的加价能力,进一步系统性地降低部门加总劳动收入份额。

最近的一支文献强调市场集中度和企业加成率的重要性。Autor et al.(2020)将美国制造业部门及其他非农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归因于“超级明星”企业的兴起:随着技术进步与经济全球化,产品市场份额逐渐集中于少数高加成率、低劳动收入份额的“超级明星”企业,从而造成行业加总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与之不同,我们的实证结果显示,“超级明星”企业并不是中国制造业部门加总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De Loecker et al.(2020)对美国上市公司及制造业企业的分析进一步表明,加成率分布顶端的企业的加成率进一步大幅上升主导了总体加成率的不断增长。与此同时,市场份额也逐渐从低加成率企业再分配至高加成率企业。高加成率企业市场势力的提升可以解释美国近些年劳动和资本份额的下降。他们的结论与本文“明日之星”企业的理论预测和实证结果一致:更高的加成率通常意味着更低的劳动收入份额,高加成率企业的加成率与市场份额同步增加,意味着企业的个体劳动份额下降、市场份额上升(“明日之星”企业),从而造成了加总劳动收入份额下降。陆雪琴和田磊(2020)基于中国的研究发现,企业规模分化效应,即低劳动收入份额企业的规模扩张造成了制造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与该研究不同,本文额外提出了两种新的机制。与本文最相关的文献是Kehrig and Vincent(2021)。通过分析美国制造业部门企业,他们发现只有结构效应导致加总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我们的研究结果虽然表明结构效应主导中国制造业部门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变化,但是共同趋势效应也起到一定作用。除此之外,我们还验证了企业个体劳动收入份额-市场份额微观机制适用于不同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特征,并量化了“明日之星”企业的影响效应。同时,结合中国特有的经济特征,我们拓展分析了国有企业对中国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本文的分析框架虽然与Kehrig and Vincent(2021)一致,但是我们的发现揭示了中国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微观基础,这对于从微观企业动态层面深入理解中国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原因与机制至关重要。

### 三、理论框架

为了分析中国宏观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变化背后的微观机制,本文首先建立了一个理论框架。考虑一个 $t$ 时期的企业 $i$ 。假设该企业以工资 $W$ 雇用 $L$ 个工人,产出 $VA$ 的增加值,则该企业的个体劳动收入份额为:

$$\lambda_{it} = \frac{W_{it}L_{it}}{VA_{it}}. \quad (1)$$

将所有企业的劳动成本和增加值分别加总后再相除,我们可以得到加总劳动收入份额:

$$\lambda_t = \frac{W_t L_t}{VA_t} = \frac{\sum_i (W_{it} L_{it})}{\sum_i VA_{it}} = \sum_i \left( \frac{VA_{it}}{\sum_i VA_{it}} \frac{W_{it} L_{it}}{VA_{it}} \right) = \sum_i (\omega_{it} \lambda_{it}), \quad (2)$$

加总劳动收入份额  $\lambda_t$  是企业个体劳动收入份额  $\lambda_{it}$  的一个加权平均,权重为该企业的增加值占所有企业增加值的比重  $\omega_{it}$ 。我们将权重定义为企业  $i$  在  $t$  时期的市场份额。

参考 Olley and Pakes(1996)的分解方法和 Kehrig and Vincent(2021)的研究框架,我们进一步将以市场份额为权重的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分解成两部分:

$$\lambda_t = \bar{\lambda}_{it} + \sum [(\omega_{it} - \bar{\omega}_{it})(\lambda_{it} - \bar{\lambda}_{it})] = \bar{\lambda}_{it} + N_t \text{Cov}(\omega_{it}, \lambda_{it}), \quad (3)$$

其中,  $N_t$  表示  $t$  时期的企业总数。等式(3)右边第一部分  $\bar{\lambda}_{it}$  表示个体劳动收入份额的简单平均,第二部分  $N_t \text{Cov}(\omega_{it}, \lambda_{it})$  表示企业个体劳动收入份额和市场份额的联合分布。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变化可表示为:

$$\Delta \lambda_t = \underbrace{\Delta \bar{\lambda}_{it}}_{\text{共同趋势效应}} + \underbrace{\Delta N_t \text{Cov}(\omega_{it}, \lambda_{it})}_{\text{结构效应}}. \quad (4)$$

从等式(4)可以看到,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变化可能由共同趋势效应造成,即  $\bar{\lambda}_{it}$  的变化。例如,当一个经济冲击影响所有或绝大多数企业时,那么这个冲击可能会造成  $\bar{\lambda}_{it}$  的变化,从而影响  $\lambda_t$ ;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变化也可能由结构效应造成,即  $\text{Cov}(\omega_{it}, \lambda_{it})$  的变化。当企业的个体劳动收入份额与市场份额以某种特定形式变化,使得它们的协方差减小时,加总劳动收入份额也会相应下降。例如,企业通过技术创新,降低个体劳动收入份额,且不断扩大市场规模,个体劳动收入份额与市场份额的反向变化,使  $\Delta N_t \text{Cov}(\omega_{it}, \lambda_{it}) < 0$ ,从而造成  $\lambda_t$  下降。

在不考虑企业进入和退出市场的情况下,我们进一步将结构效应分解成以下三个部分:

$$\Delta \text{Cov}(\omega_{it}, \lambda_{it}) = \text{Cov}(\omega_{i,t-1}, \Delta \lambda_{it}) + \text{Cov}(\Delta \omega_{it}, \lambda_{i,t-1}) + \text{Cov}(\Delta \omega_{it}, \Delta \lambda_{it}), \quad (5)$$

因此由结构效应引致的加总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种情形。

(1)  $\text{Cov}(\omega_{i,t-1}, \Delta \lambda_{it}) < 0$ :“大玩家”情境。初始市场份额  $\omega_{i,t-1}$  可能和企业的个体劳动收入份额变化  $\Delta \lambda_{it}$  负相关。例如,考虑在行业内占据较大市场份额的企业,它们更有能力调整资本-劳动比,在保持产出不变的条件下使用更多的机器设备,投入更少的劳动,从而降低个体劳动收入份额。在计算加总劳动收入份额时,因为“大玩家”企业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被分配更高的权重,所以“大玩家”企业个体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可能会带来加总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

(2)  $\text{Cov}(\Delta \omega_{it}, \lambda_{i,t-1}) < 0$ :“超级明星”情境。企业初始的个体劳动收入份额  $\lambda_{i,t-1}$  可能和市场份额变化  $\Delta \omega_{it}$  负相关。例如,考虑一类个体劳动收入份额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的企业,假设其随着时间推移变得更具有市场势力。由于分配给该类企业的权重不断增大,因此在计算加权劳动收入份额时,这部分“超级明星”企业的崛起会带来加总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3)  $\text{Cov}(\Delta\omega_{it}, \Delta\lambda_{it}) < 0$ : “明日之星”情境。企业的个体劳动收入份额变化  $\Delta\lambda_{it}$  可能和该企业的市场份额变化  $\Delta\omega_{it}$  负相关。例如, 考虑经历过正向技术冲击或者享受特殊政策优惠的一类企业, 它们可能在市场规模快速成长的同时, 降低个体劳动收入份额。这部分“明日之星”企业的出现带来  $\text{Cov}(\Delta\omega_{it}, \Delta\lambda_{it}) < 0$ , 从而降低个体劳动收入份额和市场份额的联合分布项  $\text{Cov}(\omega_{it}, \lambda_{it})$ , 加总劳动收入份额  $\lambda_t$  也随之相应下降。

将等式(4)和等式(5)的协方差分解形式对应到求和加总形式:

$$\begin{aligned} \Delta\lambda_{it} = & \Delta\bar{\lambda}_{it} + \Sigma\{(\omega_{it-1} - \bar{\omega}_{it-1})[\lambda_{it} - \lambda_{it-1} - (\bar{\lambda}_{it} - \bar{\lambda}_{it-1})]\} + \\ & \Sigma\{[\omega_{it} - \omega_{it-1} - (\bar{\omega}_{it} - \bar{\omega}_{it-1})](\lambda_{it-1} - \bar{\lambda}_{it-1})\} + \\ & \Sigma\{[\omega_{it} - \omega_{it-1} - (\bar{\omega}_{it} - \bar{\omega}_{it-1})][\lambda_{it} - \lambda_{it-1} - (\bar{\lambda}_{it} - \bar{\lambda}_{it-1})]\}, \end{aligned} \quad (6)$$

其中, 等式(6)右边的第二至四项分别对应“大玩家”、“超级明星”和“明日之星”情形。我们将在第五部分给出各年份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年度及累计变化, 以及各结构变化的具体数值。

#### 四、数据和变量衡量

本文主要使用由国家统计局收集整理的数据 1998—2007 年工业企业年度调查数据: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下文简称工企库)。<sup>①</sup> 工企库中包含丰富的企业基本信息和财务指标, 是被学界广泛使用的大型微观数据库之一。我们通过等式(7)计算  $t$  年份的加总劳动收入份额:

$$\lambda_t = \frac{W_t L_t}{VA_t}, \quad (7)$$

其中  $W_t L_t$  和  $VA_t$  分别表示  $t$  年份制造业部门的劳动投入成本和增加值总和。因为分子和分母均为当年名义值, 所以测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不会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我们使用工资总额衡量劳动投入成本, 使用企业工资总额、营业利润、折旧与生产税的总和计算收入法增加值。<sup>②</sup> 根据同样的衡量方式可以计算出企业个体劳动收入份额, 具体公式为:

$$\lambda_{it} = \frac{\text{应付工资总额}_{it}}{\text{应付工资总额}_{it} + \text{营业利润}_{it} + \text{本年折旧}_{it} + \text{应交增值税}_{it} + \text{生产税金及附加}_{it}}. \quad (8)$$

我们在附录 I 中展示了详细的样本筛选条件和描述性统计结果。<sup>③</sup> 本文的最终样本包含 1 518 794 条企业-年份观测值。

本文还使用 2008—2016 年中国税收调查数据(下文简称税调数据)进一步分析 2008

<sup>①</sup> 因为 2008—2010 年工企库缺少工资这一核心变量, 所以这三个年份的数据无法使用; 为了统计数据的连续性, 我们未使用 2011—2013 年的数据。

<sup>②</sup> 增加值的计算主要有收入法和生产法两种, 工企库中自行统计的增加值是根据生产法计算的增加值(钱震杰和朱晓冬, 2013)。虽然基于不同增加值计算方法得出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化趋势一致, 但是具体数值仍存在一定差异。因此本文使用企业自汇报增加值(2004 年使用生产法增加值填补)计算出的劳动收入份额作为稳健性检验。限于篇幅, 相关结果备索。

<sup>③</sup> 限于篇幅, 附录未在正文列示, 感兴趣的读者可在《经济学》(季刊)官网(<https://ceq.ccer.pku.edu.cn>)下载。

年之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微观基础。该数据由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收集,覆盖了所有行业不同规模的企业,包含丰富的企业财务和税务指标。税调数据的抽样企业贡献了超过75%的全国增值税收入,具有全国代表性(Chen et al., 2023)。我们剔除了不符合会计准则或关键变量缺失的观测值。为了与工企库数据对应,我们将税调数据样本限制在制造业行业,但包含大中小微不同规模的企业。我们将在第五部分第四节展示基于税调数据分析的结果。

## 五、劳动收入份额：宏观趋势和微观再分配

### (一) 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结构效应主导

等式(4)表明劳动收入份额变化可由共同趋势效应和结构效应解释。图1展示了1998—2007年中国制造业部门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和企业个体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可以发现,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和平均水平的个体劳动收入份额变化存在显著区别,且在1998—2003年间尤为明显。个体劳动收入份额在1998—2007年间下降约3.1个百分点;加总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约7.6个百分点,为个体水平值变化的2.5倍。在中国加入WTO之前,即1998—2001年间,个体劳动收入份额几乎没有变化(下降幅度约为1.1个百分点),而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却出现大幅下滑(降幅约为3.3个百分点)。加入WTO之后的两年内,加总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大幅下滑,下降约3.1个百分点。加入WTO带来的贸易自由化,可能通过降低资本品成本、技术引进成本和中间投入品价格,造成企业减少劳动投入,从而降低劳动收入份额(余森杰和梁中华,2014)。图1的结果表明:对于1998—2007年中国制造业加总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共同趋势效应存在一定作用,结构效应占主导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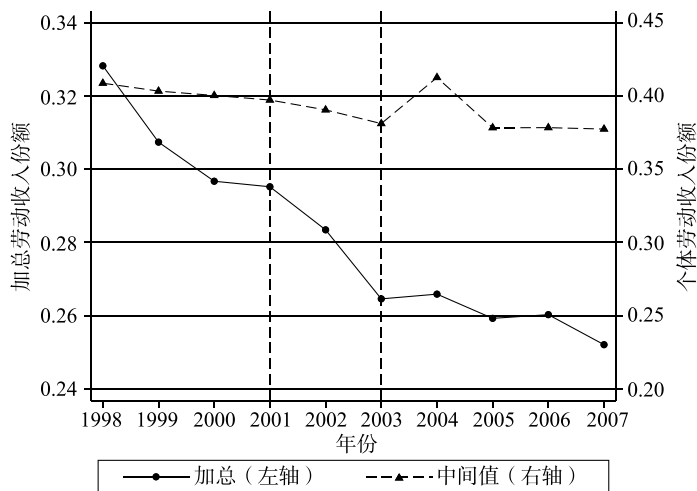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制造业部门加总和个体劳动收入份额变化(1998—2007年)

注:该图给出1998—2007年的中国制造业部门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实线,左轴)和企业层面的个体劳动收入份额(虚线,右轴)的动态变化;三角形虚线给出的是个体劳动收入份额的中位数,该中位数由49%—51%分位点样本的观测值简单平均得到。

## (二) 结构效应：劳动收入份额与市场份额再分配

宏观加总和微观个体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显著差异显示出结构效应的重要性。这意味着,市场份额 $\omega_{it}$ 和企业个体劳动收入份额 $\lambda_{it}$ 的联合分布变化 $\Delta\text{Cov}(\omega_{it}, \lambda_{it})$ 是加总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来源。我们将企业按劳动收入份额从0至1.4分为14组,分别计算每一年各组企业的增加值和企业数量总和和占当年所有组别企业对应指标总和的比例。考虑到行业之间存在特定的差异性,我们首先在每个行业内计算,再以行业的工业增加值占比作为权重进行加权平均,得出整个制造业部门工业增加值和企业数量对应的劳动收入份额分布。

图2分别给出1998年和2007年中国制造业部门不同劳动收入份额企业的数量和市场份额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出,在不同劳动收入份额组别上,企业的相对数量在1998年和2007年之间没有发生明显变化,绝大多数企业集中分布在0.1—0.5劳动收入份额组别中。虽然低劳动收入份额企业的相对数量没有明显增加,但是其所占的市场份额在样本期间快速增长。1998年中国制造业部门绝大多数的增加值由中低劳动收入份额(0—0.4)企业产出,随着经济活动逐渐转向低劳动收入份额范畴,到2007年,超过半数(52%)的增加值产出来自低劳动收入份额(0—0.2)企业。少数低劳动收入份额企业能够产出部门大部分增加值的现象意味着,市场份额再分配至低劳动收入份额企业是宏观加总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一个关键特征。图2的结果进一步证明了中国制造业部门加总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主要是由结构效应引起,即企业个体劳动收入份额与市场份额的协方差下降, $\Delta\text{Cov}(\omega_{it}, \lambda_{it}) < 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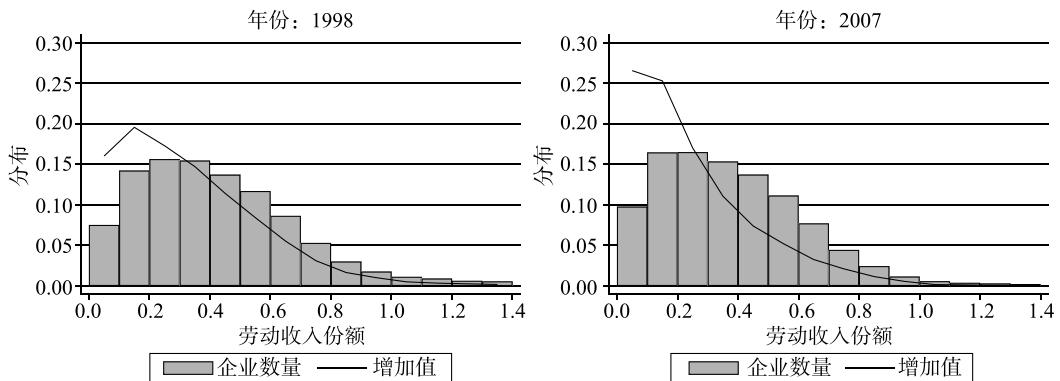


图2 劳动收入份额与市场份额变化(1998年、2007年)

注:该图分别给出中国制造业部门1998年和2007年企业数量、市场份额(增加值)相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分布。为了控制行业间特定差异,我们先在中国行业分类标准(CICS)两位码行业内分别计算,再根据当年行业间增加值占比加权平均到每一个劳动收入份额组内。附图A1给出1998—2007年整个样本期内的动态分布。

## (三) 劳动收入份额与市场份额：“大玩家”、“超级明星”，抑或“明日之星”

在理论框架部分,我们将结构效应 $\Delta\text{Cov}(\lambda_{it}, \omega_{it})$ 进一步分解为:“大玩家”情境



( $\text{Cov}(\omega_{i,t-1}, \Delta\lambda_{it})$ )、“超级明星”情境 ( $\text{Cov}(\Delta\omega_{it}, \lambda_{i,t-1})$ ) 和“明日之星”情境 ( $\text{Cov}(\Delta\omega_{it}, \Delta\lambda_{it})$ )。这三种情境均可能造成负向的结构效应。在这一节,我们将使用详细的数据来验证具体是哪一种(几种)情境能够解释结构效应。

根据求和和加总形式的等式(6),我们在图3中分别给出加总劳动收入份额、未加权个体劳动收入份额平均和对应三种情境指标的年度和累计变化情况。结果显示:(1)“明日之星”企业是1998—2007年中国制造业部门加总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的主要驱动因素。从累计变动程度来看,“明日之星”企业对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贡献甚至超过了加总劳动收入份额自身的变化;从具体数值上来看,“明日之星”企业导致1998—2007年中国制造业加总劳动收入份额累计下降11.0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如果不存在“明日之星”企业,那么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将从2007年的0.23增加到0.34(基于平衡面板的结果);(2)“大玩家”和“超级明星”企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加总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在1998—2007年间提升了加总劳动收入份额5个百分点左右;(3)共同趋势效应对加总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贡献随时间逐渐减弱。从累计数值上来看,共同趋势效应仅导致样本期间加总劳动收入份额2.4个百分点的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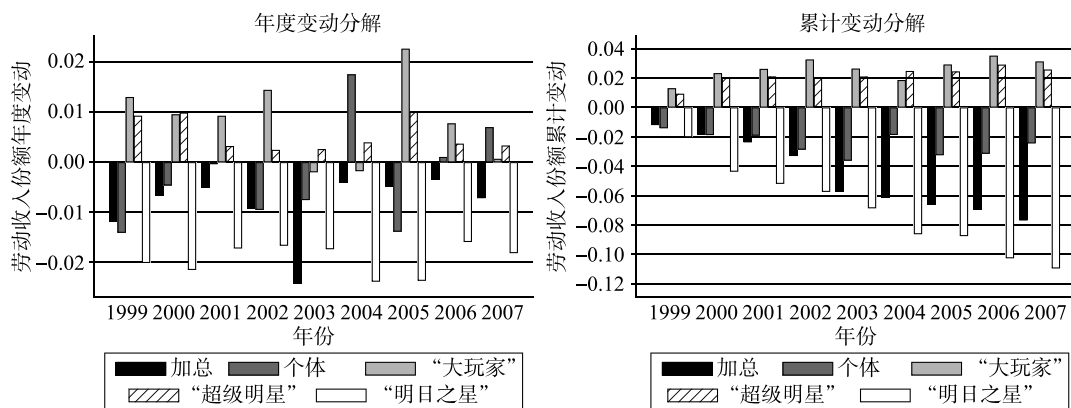


图3 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变化分解(1998—2007年)

注:该图给出等式(6)对应指标变化情况。图例由左至右依次表示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年度和累计变化  $\Delta\lambda_t$ , 个体劳动收入份额年度和累计变化  $\Delta\lambda_i$ , 以及三种情境指标的年度和累计变化,即“大玩家”:  $\sum\{(\omega_{it-1} - \bar{\omega}_{it-1})[\lambda_{it} - \lambda_{it-1} - (\bar{\lambda}_{it} - \bar{\lambda}_{it-1})]\}$ , “超级明星”:  $\sum\{[\omega_{it} - \omega_{it-1} - (\bar{\omega}_{it} - \bar{\omega}_{it-1})](\lambda_{it-1} - \bar{\lambda}_{it-1})\}$  和“明日之星”:  $\sum\{[\omega_{it} - \omega_{it-1} - (\bar{\omega}_{it} - \bar{\omega}_{it-1})][\lambda_{it} - \lambda_{it-1} - (\bar{\lambda}_{it} - \bar{\lambda}_{it-1})]\}$ 。所有的数值均基于平衡面板数据计算得出。

此外,在附录II中,我们基于反事实分析法,通过排除“大玩家”和“超级明星”情境的存在,进一步验证了“明日之星”企业对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主导作用。

#### (四) 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化:2008—2016年

基于2008—2016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我们发现结构效应仍是中国制造业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主导因素。我们首先呈现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制造业加总和个体平均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趋势。从图4可以看出,与现有文献一致,个体劳动收入份额在2008年之后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然而,加总劳动收入份额表现出明显不同于个体

劳动收入份额的趋势,尤其是在2008—2010年间和2012—2016年间,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出现明显大幅下降。加总值即使在2010—2012年间增加,其变化幅度也明显大于个体平均值变化幅度。加总与个体劳动收入份额显著不同的变化趋势表明,结构效应在2008年之后中国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化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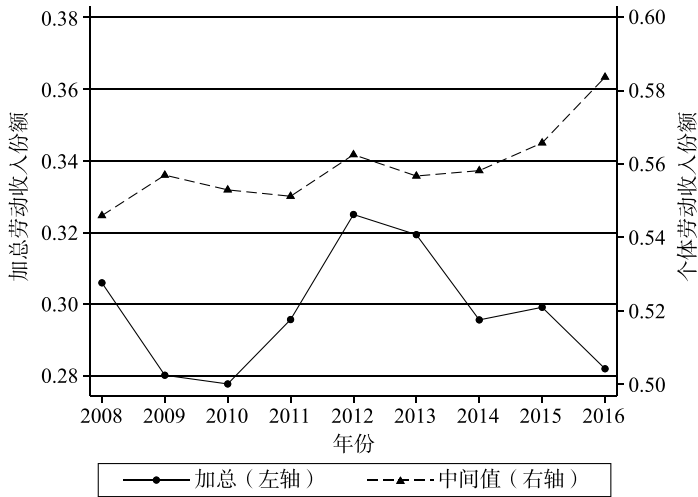


图4 中国制造业部门加总和个体劳动收入份额变化(2008—2016年)

注:使用全国税收调查数据,该图给出2008—2016年的中国制造业部门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实线,左轴)和企业层面的个体劳动收入份额(虚线,右轴)的动态变化;三角形虚线给出的是个体劳动收入份额的中位数,该中位数由49%—51%分位的子样本观测值简单平均得到。

接着我们分别给出2008年和2016年中国制造业部门不同劳动收入份额企业的数量、劳动投入和市场份额的分布情况。从图5可知,相较于2008年,201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量和劳动投入相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分布基本没有发生变化,仅表现出劳动投入从中等劳动收入份额向低劳动收入份额企业略微转移的特征。然而,增加值的分布在2008—2016年间出现了较大变化,具体表现为增加值逐渐集中在低劳动收入份额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小于0.1的企业在2008年产出整个制造业约22%的增加值,在2016年,该占比约为31%,增长9个百分点。这说明在2008—2016年间,中国制造业也表现出市场份额转移至低劳动收入份额企业的动态特征。

最后,在附录Ⅲ中,我们基于等式(6)对2008年之后中国制造业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变化进行分解,发现“明日之星”企业是唯一造成加总与个体劳动收入份额反向变化的原因。使用税调数据,我们对2008—2016年中国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化分析得出的结论,与基于工企库1998—2007分析的结论一致:结构效应主导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变化;“明日之星”企业是中国制造业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主要驱动力量。因此,微观企业的个体劳动收入份额-市场份额动态变化规律对宏观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影响机制是持续存在的,且适用于不同劳动收入份额变化趋势。这进一步体现了本文研究视角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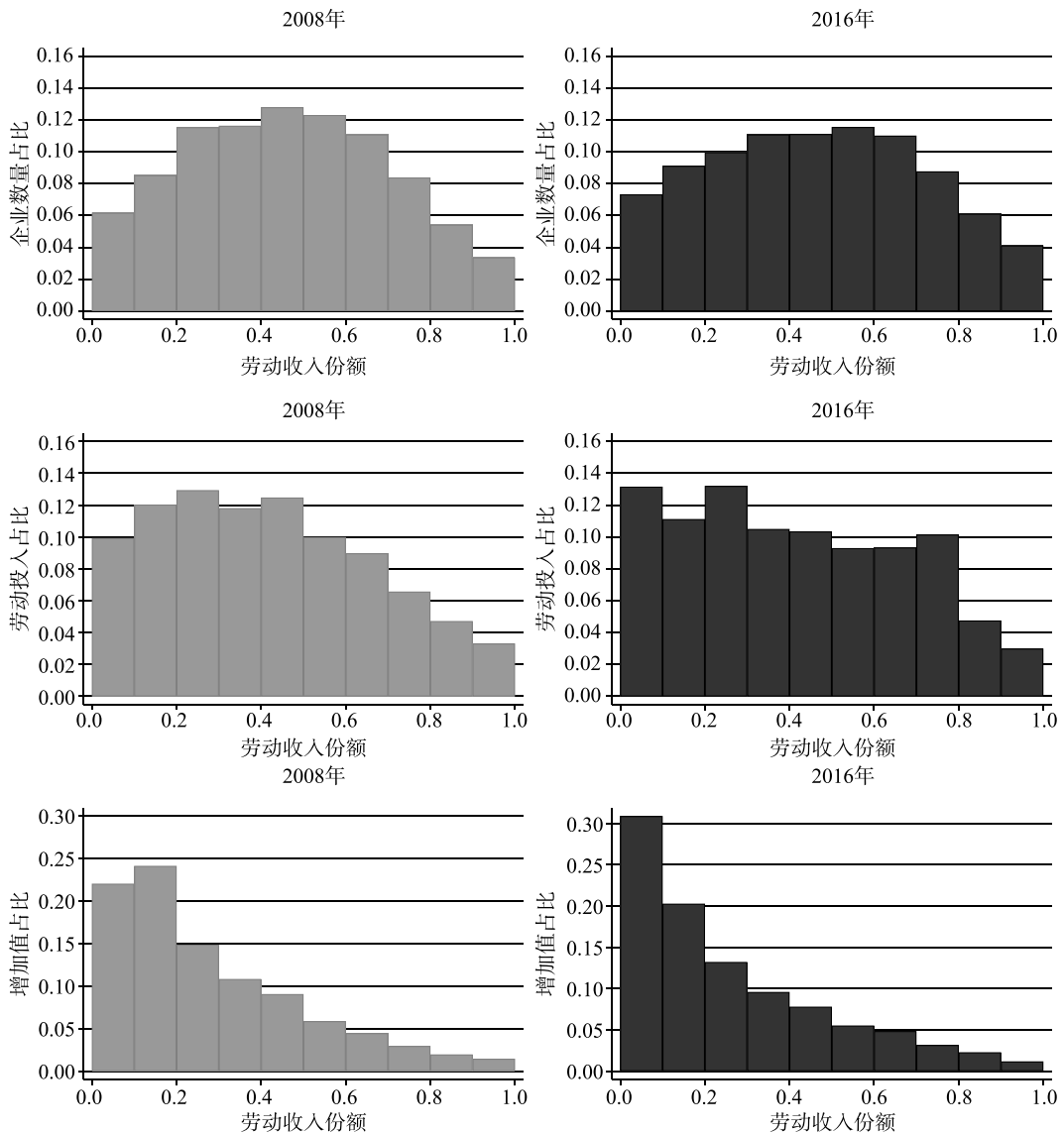


图5 企业数量、劳动投入及增加值分布(2008年、2016年)

注:使用全国税收调查数据,该图给出中国制造业部门2008年和2016年企业数量、劳动投入(员工数)及增加值相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分布。为了控制行业间特定差异,我们先在中国行业分类标准(CICS)两位码行业内分别计算,再根据当年行业间增加值占比加权平均到每一个劳动收入份额组内。

## 六、劳动收入份额变化:国有企业的角色

在这一部分,我们首先将企业分为国有、私营和外资三种类型并开展异质性分析,初步探究不同性质企业对中国制造业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影响。接着,我们分别在每类企业内部将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分解为四种效应,并结合市场份额动态全面量化国有和私营企业对制造业部门的影响。

### (一) 异质性：国有、私营和外资企业

根据实收资本中各类型资本比例,我们将企业划分为国有、私营和外资企业,并在每种类型企业的子样本内分别计算加总和个体劳动收入份额。我们在图 6 分别展示了国有、私营和外资企业各子样本加总和个体劳动收入份额的异质性动态变化,主要有两点发现:(1)国有和私营部门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均出现明显下降,且国有部门最显著。在 1998—2007 年间,国有企业平均个体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约 10 个百分点,而其加总劳动收入份额降幅高达 15 个百分点,约为个体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幅度的 1.5 倍,共同趋势效应起主要作用,结构效应的影响不可忽视。私营部门加总劳动收入份额也表现出与个体劳动收入份额明显不同的下降趋势:加总水平值从 1998 年的 0.33 下降至 2007 年的 0.27,而个体水平值 10 年间仅下降约 0.02,结构效应在私营部门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2)与国有和私营企业显示的趋势相反,外资企业无论在个体劳动收入份额还是在加总劳动收入份额方面均表现出轻微上升趋势,且两者变化趋势相似。国有部门企业为何会表现出加总和个体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偏离? 国企改革可能起到关键作用。我们在附录 IV 中对此展开进一步的讨论,并从存续、转型和新进入国企视角深入地探讨国有部门内部劳动收入份额的动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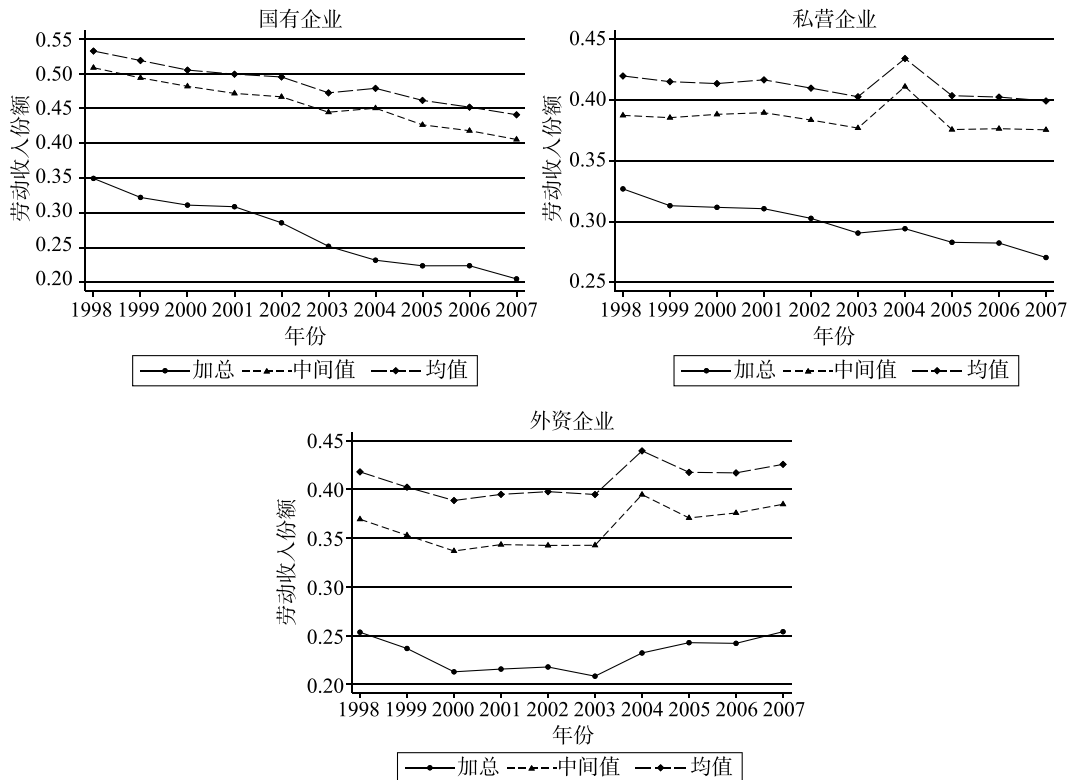


图 6 国有、私营和外资企业加总与个体劳动收入份额变化(1998—2007 年)

注:我们将实收资本中国有资本占比超过 0.5 的企业定义为国有企业(若企业在样本期初或期末被定义为国有企业,我们便将该企业自始至终划分在国有企业组别);将外资占比超过 0.25 且国有资本占比不超过 0.5 的企业定义为外资企业;其他企业被定义为私营企业。实线、短虚线和长虚线分别表示加总劳动收入份额、个体劳动收入份额中位数(49—51 百分位平均值)和平均值。

基于以上发现,同时结合附图 A2 展示的国有和私营企业在制造业部门增加值产出上的重要性,我们初步推断国有和私营企业在制造业部门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变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 (二) 劳动收入份额变化: 国有企业重要角色

既然国有和私营企业分别表现出与整体制造业企业类似的变化趋势,那么其在制造业部门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变化中具体扮演着什么角色? 在这一节,我们通过进一步的分解,深入量化分析国有和私营企业对制造业加总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根据等式(2),我们将制造业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分解为三个部分:

$$\lambda_t = \omega_{soe,t} \lambda_{soe,t} + \omega_{pe,t} \lambda_{pe,t} + \omega_{fe,t} \lambda_{fe,t}, \quad (9)$$

其中,  $\omega_{soe,t}$ ,  $\omega_{pe,t}$  和  $\omega_{fe,t}$  分别表示国有、私营和外资企业在  $t$  时期的市场份额,  $\lambda_{soe,t}$ ,  $\lambda_{pe,t}$  和  $\lambda_{fe,t}$  对应表示三种类型企业的个体劳动收入份额。

从国有、私营和外资三类企业视角,我们发现中国制造业加总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来自“组内”而非“组间”变化(附图 A3 和附图 A4)。根据该结论,我们假设国有、私营和外资三种类型企业之间市场份额的变化不会系统性地影响加总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因此,我们通过等式(10)近似计算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变化:

$$\Delta \lambda_t \approx \sum_k [\omega_{kt} \Delta \lambda_{kt}] = \sum_k [\omega_{kt} (\Delta \bar{\lambda}_{kt} + Big_{kt} + Super_{kt} + Rising_{kt})], \quad (10)$$

其中,  $k = soe, pe, fe$ 。我们先在每种类型企业内部将劳动收入份额变化 ( $\Delta \lambda_{kt}$ ) 分解为四种效应: 共同趋势 ( $\Delta \bar{\lambda}_{kt}$ )、“大玩家” ( $Big_{kt}$ )、“超级明星” ( $Super_{kt}$ ) 和“明日之星” ( $Rising_{kt}$ ), 然后再结合各类型企业市场份额 ( $\omega_{kt}$ ) 总体情况, 对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变化进行全面的量化分析。

基于等式(6),图7上半部分分别呈现了国有和私营企业加总劳动收入份额累计变化的分解。可以看出:(1)“明日之星”企业依旧是推动国有和私营企业加总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最重要的因素,且在私营部门中,“明日之星”的相对作用更为凸显。(2)在私营企业中,“大玩家”企业对缓解加总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起重要作用,“超级明星”企业的缓解作用相对较小。在国有企业中,虽然“大玩家”和“超级明星”企业均对1998—2007年间加总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起反向拉升作用,但影响十分有限。(3)在样本期内,国有企业加总劳动收入份额累计下降幅度约为私营企业的3倍,这说明国有企业显著贡献了中国制造业加总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我们将在下文结合市场份额动态进一步证明此结论。

根据等式(10),我们在图7的下半部分展示了制造业加总劳动收入份额更细致的分解。结果显示:(1)国有企业是中国制造业加总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贡献者。1998—2007年间,国有企业为制造业部门加总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贡献了约6.4个百分点,而同时期制造业加总劳动收入份额仅下降约7.7个百分点(平衡面板);国有部门中“明日之星”企业贡献了62.2%(0.0478/0.0769)的制造业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变化。(2)私营企业贡献了加总劳动收入份额29.3%(0.0225/0.0769)的变化,对中国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的

下降也起到重要作用。其中,私营部门“明日之星”企业的影响效应堪比国有部门的“明日之星”企业,而私营部门“大玩家”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明日之星”带来的负向结构效应,从而造成了私营部门对整体制造业部门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相对较小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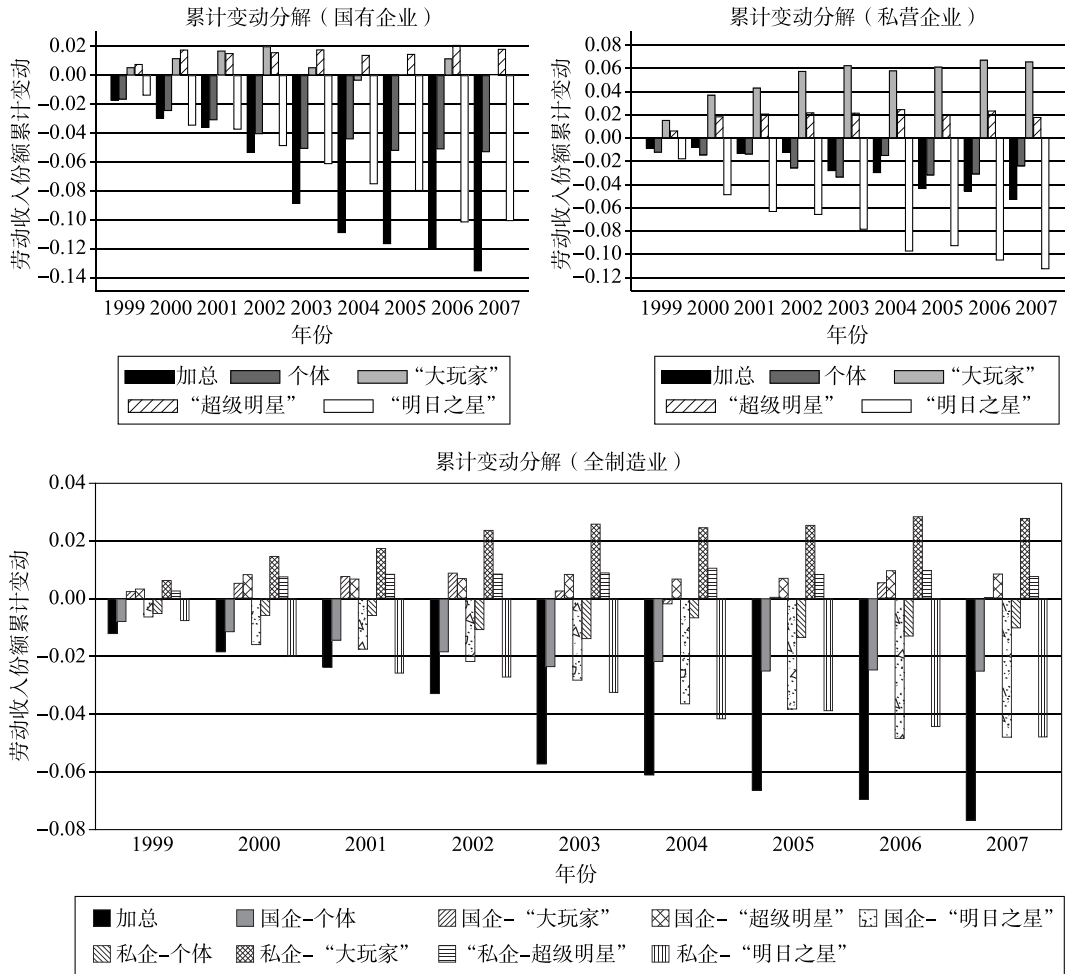


图7 国有、私营与整体制造业企业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变化分解(1998—2007年)

注:该图上半部分基于国有和私营企业样本,分别给出等式(6)各对应指标变化情况。下半部分展示出基于等式(10)的分解结果。所有的数值均基于平衡面板数据计算得出。

针对国有和私营企业的分析结果表明:国有和私营企业内部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微观动态机制,与全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微观基础相似。在国有和私营企业样本中,“明日之星”企业依旧是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主要因素。“明日之星”的主导效应和“大玩家”的反向作用,在私营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最后,我们发现国有企业显著贡献了1998—2007年中国制造业部门加总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国有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变化解释了超过80%的制造业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变化。

## 七、政策含义和研究局限

要素收入分配是重大的政策议题,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政策含义。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会造成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失衡,从而扩大收入不平等;社会消费需求能力下降,从而削弱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继续深入研究劳动收入份额变化,具有以下两方面的现实意义:第一,厘清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微观影响机制,有助于为政策制定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第二,中国“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劳动收入份额过低会制约居民消费需求,因此需要政策调整要素收入分配格局,本文的研究为此提供了理论基础。因此,一方面,本文从与以往研究不同的维度和视角、影响机制和逻辑分析了中国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化;另一方面,本文的结论对理解中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矛盾、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目标具有重要政策意义。

我们的研究目的并不在于分析引起中国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化背后的具体因素并进行因果推断,而是为理解劳动收入份额变化提供一个微观动态层面的研究视角。然而,我们的研究和结论仍旧存在一些限制,值得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1)近20年,中国服务业部门出现较快增长,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04年的41.2%增长至2023年的54.6%,且第三产业部门覆盖了中国近一半的就业人员。<sup>①</sup> 我们的研究只聚焦于制造业部门,因此无法观测到中国整体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特征并对其解析。从企业微观视角对第三产业内部或整体三次产业进行分析将会提供更丰富的政策含义。(2)国有企业影响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具体机制是什么,以及国企改革是否对中国制造业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变化存在因果效应,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究和考察。

## 参考文献

- [1] Acemoglu, D., and P. Restrepo, “The Race between Machine and Man: Implications of Technology for Growth, Factor Shares and Employ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8, 108(6), 1488-1542.
- [2] Acemoglu, D., and P. Restrepo, “Robots and Jobs: Evidence from US Labor Market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20, 128(6), 2188-2244.
- [3] Ahsan, R.N., and D. Mitra,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Labor’s Slice of the Pie: Evidence from Indian Firm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4, 108, 1-16.
- [4] Autor, D., and A. Salomons, “Is Automation Labor Share-Displacing? Productivity Growth, Employment, and the Labor Share”,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2018, 49(1), 1-63.
- [5] Autor, D., D. Dorn, L. F. Katz, C. Patterson, and J. V. Reenen, “The Fall of the Labor Share and the Rise of Superstar Firm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20, 135(2), 645-709.
- [6] 白重恩、路江涌、陶志刚,“国有企业改制效果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06年第8期,第4—13+69页。

①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s://www.stats.gov.cn/sj/>。

- [7] 白重恩、钱震杰，“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经济研究》，2009年第3期，第27—41页。
- [8] 白重恩、钱震杰，“劳动收入份额决定因素：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世界经济》，2010年第12期，第3—27页。
- [9] 白重恩、钱震杰、武康平，“中国工业部门要素分配份额决定因素研究”，《经济研究》，2008年第8期，第16—28页。
- [10] 柏培文、王亚文，“中国细分行业技能资本替代弹性与技术偏向性”，《经济研究》，2023年第3期，第135—153页。
- [11] 柏培文、杨志才，“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占比——兼析金融危机后的影响”，《管理世界》，2019年第5期，第78—91页。
- [12] Bergholt, D., F. Furlanetto, and N. Maffei-Faccioli, “The Decline of the Labor Share: New Empirical Evidence”,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2022, 14(3), 163-198.
- [13] Blanchard, O., and F. Giavazzi, “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Regulation and Deregulation in Goods and Labor Market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3, 118(3), 879-907.
- [14] Böckerman, P., and M. Maliranta, “Globalization, Creative Destruction, and Labour Share Change: Evidence on the Determinants and Mechanisms from Longitudinal Plant-Level Data”, *Oxford Economic Papers*, 2012, 64(2), 259-280.
- [15] 陈鸣、李志远、吴磊，“中国的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化：企业动态生产方式视角”，《经济学》(季刊)，2023年第4期，第1245—1263页。
- [16] Chen, Z., X. Jiang, Z. Liu, J. C. S. Serrato, and D. Y. Xu, “Tax Policy and Lumpy Investment Behaviour: Evidence from China’s VAT Reform”,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23, 90(2), 634-674.
- [17] Ciminelli, G., R. Duval, and D. Furceri, “Employment Protection Deregulation and Labor Shares in Advanced Economie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22, 104(6), 1174-1190.
- [18] De Loecker, J., J. Eeckhout, and G. Unger, “The Rise of Market Power and the Macroeconomic Implication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20, 135(2), 561-644.
- [19] 杜鹏程、王姝勋、徐舒，“税收征管、企业避税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所得税征管范围改革的证据”，《管理世界》，2021年第7期，第105—118+8页。
- [20] Elsby, M., B. Hobijn, and A. Sahin, “The Decline of the U.S. Labor Share”,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2013, 44(2), 1-52.
- [21] Gollin, D., “Getting Income Shares Righ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2, 110(2), 458-474.
- [22] Guvenen, F., R. J. Mataloni Jr., D. G. Rassier, and K. J. Ruhl, “Offshore Profit Shifting and Aggregate Measurement: Balance of Payments, Foreign Investment, Productivity, and the Labor Shar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22, 112(6), 1848-1884.
- [23] 黄先海、徐圣，“中国劳动收入比重下降成因分析——基于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的视角”，《经济研究》，2009年第7期，第34—44页。
- [24] 贾坤、申广军，“企业风险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中国工业部门的证据”，《经济研究》，2016年第5期，第116—129页。
- [25] 蒋为、黄玖立，“国际生产分割、要素禀赋与劳动收入份额：理论与经验研究”，《世界经济》，2014年第5期，第28—50页。
- [26] Kaldor, 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Hague, D.C. (eds.), *The Theory of Capital*.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61, 177-222.
- [27] Kamal, F., M. E. Lovely, and D. Mitra, “Trade Liberalisation and Labour Shares in China”, *The World Economy*, 2019, 42(12), 3588-3618.
- [28] Kaymak, B., and I. Schott, “Corporate Tax Cuts and the Decline in the Manufacturing Labor Share”, *Econometrica*, 2023, 91(6), 2371-2408.



- [29] Karabarbounis, L., and B. Neiman, "The Global Decline of the Labor Shar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4, 129(1), 61-103.
- [30] Kehrig, M., and N. Vincent, "The Micro-Level Anatomy of the Labor Share Declin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21, 136(2), 1031-1087.
- [31] Li, B., C. Liu, and S. T. Sun, "Do Corporate Income Tax Cuts Decrease Labor Share?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21, 150, 102624.
- [32] 李稻葵、刘森林、王红领, "GDP 中劳动份额演变的 U 型规律", 《经济研究》, 2009 年第 1 期, 第 70—82 页。
- [33] 刘维林, "新发展格局下全球生产网络与劳动报酬份额变动", 《经济研究》, 2022 年第 10 期, 第 86—102 页。
- [34] 刘亚琳、茅锐、姚洋, "结构转型、金融危机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 《经济学》(季刊), 2018 年第 2 期, 第 609—632 页。
- [35] 刘亚琳、申广军、姚洋, "我国劳动收入份额: 新变化与再考察", 《经济学》(季刊), 2022 年第 5 期, 第 1467—1488 页。
- [36] 陆雪琴、田磊, "企业规模分化与劳动收入份额", 《世界经济》, 2020 年第 9 期, 第 27—48 页。
- [37] 罗长远、张军, "经济发展中的劳动收入占比: 基于中国产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 2009a 年第 4 期, 第 65—79+206 页。
- [38] 罗长远、张军, "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经济学解释——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管理世界》, 2009b 年第 5 期, 第 25—35 页。
- [39] Olley, G. S., and A. Pakes, "The Dynamics of Productivity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Industry", *Econometrica*, 1996, 64(6), 1263-1297.
- [40] Panon, L., "Labor Share, Foreign Demand and Superstar Exporter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22, 139, 103678.
- [41] Piketty, T., "About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 Proceeding*, 2015, 105(5), 48-53.
- [42] 钱雪松、石鑫, "加强劳动保护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吗? ——基于《劳动合同法》实施的经验研究", 《经济学》(季刊), 2024 年第 1 期, 第 286—302 页。
- [43] 钱震杰、朱晓冬, "中国的劳动份额是否真的很低: 基于制造业的国际比较研究", 《世界经济》, 2013 年第 10 期, 第 27—53 页。
- [44] 邵敏、黄玖立, "外资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基于工业行业的经验研究", 《经济学》(季刊), 2010 年第 4 期, 第 1189—1210 页。
- [45] 汪昊, "中国劳动和资本税收负担及分配效应", 《经济研究》, 2023 年第 4 期, 第 95—113 页。
- [46] 余森杰、梁中华, "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基于制造业贸易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管理世界》, 2014 年第 7 期, 第 22—31 页。
- [47] 张杰、陈志远、周晓艳, "出口对劳动收入份额抑制效应研究——基于微观视角的经验证据",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2 年第 7 期, 第 44—60 页。
- [48] 张军、张席斌、张丽娜, "中国劳动报酬份额变化的动态一般均衡分析", 《经济研究》, 2022 年第 7 期, 第 26—44 页。
- [49] 周明海、肖文、姚先国, "企业异质性、所有制结构与劳动收入份额", 《管理世界》, 2010 年第 10 期, 第 24—33 页。

## Changes in Labor Share of China: A Micro-level Anatomy

ZHANG Junsen YU Qi ZHOU Kang\*

(Zhejiang University)

**Abstract:** Using comprehensive enterprise-level databases, we study the micro-basis of different trends in aggregate and individual labor share of manufacturing sector in China during 1998-2016. We find that: (1) redistributing value added towards the bottom of labor share distribution causes the decline of aggregate labor share; (2) the redistribution effect is driven by enterprises gradually increasing market share and reducing labor share; (3) state-owned enterprises contribute significantly to the changes in aggregate labor share. The analysis of this paper enhance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nge in China's labor sha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ynamic change of micro-enterprises.

**Keywords:** labor share; market share; composition effects

**JEL Classification:** E25, L11, L60

---

\* Corresponding Author: ZHOU Kang, School of Economics, Zhejiang University, No. 866 Yuhangtang Road, Xihu District, Hangzhou, Zhejiang 310058, China; Tel:86-571-88981256;E-mail: kang\_zhou@zju.edu.cn.